

## [Studies in Literature]

# The Allegory of a Techno-Feudalist Future in *Machines Like Me*

YANG Xinyi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anuary 30, 2026

Accepted: March 5, 2026

Published: March 31,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YANG Xinyi. (2026). The Allegory of a Techno-Feudalist Future in *Machines Like M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 177–184,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20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20>

**Abstract:** In *Machines Like Me*, Ian McEwan constructs an alternative historical narrative that presents a paradoxical social landscape in which advanc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exists with a structurally misaligned social order.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echno-Feudalism,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novel shifts from a liberating force to a structural mechanism that reconstructs relations of domination and dependency.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social morphology depicted in the novel marks a transition from market capitalism to a “high-tech neo-feudal” order. Within this system, the technological elite, represented by Alan Turing, establish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by monopolizing algorithmic infrastructures and “cloud territories,” extracting value through what has been conceptualized as “cloud rent.” Meanwhile, ordinary individuals such as Charlie are transformed into “digital serfs,” whose apparent empowerment through technology conceals deepening structural dependency. The paper contends that Charlie’s destruction of the android Adam should not be interpreted as an idealized political resistance, but rather as a Ludditic form of negative rupture that exposes ethical contradictions embedded in techno-feudal dependency. Through this allegorical narrative, McEwan anticipates the potential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echno-Feudal governance and highlights the ethical challenges posed by algorithmic rationality in contemporary technological societies.

**Keywords:** Ian McEwan; *Machines Like Me*; Techno-Feudalism; cloud rent; subjectivity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YANG Xinyi is a master student a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She is currently pursuing her master’s degree in English Literature. Her academic interests focus on literary studies and related fields. Her email address is 1287799763@qq.com.



# 《我這樣的機器》中的技術封建主義未來寓言

楊欣怡

四川外國語大學

**摘要:**伊恩·麥克尤恩在《我這樣的機器》中通過構建『替代歷史』的敘事策略,描繪了一個人工智能高度發達,社會結構卻錯位的悖論性圖景。本文引入『技術封建主義』理論視閥,審視小說中技術如何脫離解放功能,轉而異化為重構等級秩序的結構性力量。研究發現,小說中的社會形態已從市場資本主義滑向『高科技-新封建』秩序:以圖靈為代表的科技精英化身為壟斷雲端空間與核心算法的『技術領主』,通過汲取『雲地租』建立技術主權;而以查理為代表的普通個體則在技術賦權與依附並存的矛盾狀態中逐漸淪為『數字農奴』。文章指出,查理摧毀人造人亞當的行為並非理想化的政治反抗,而是一種具有虛德主義特征的否定性行動,它揭示了技術依附關係內部的倫理裂隙。本文認為,麥克尤恩借助寓言化敘事,對技術封建主義潛在的社會後果進行了文學預演,並提示當代社會在技術治理擴張中面臨的人文與倫理危機。

**關鍵詞:**伊恩·麥克尤恩;《我這樣的機器》;技術封建主義;雲地租;主體性

## 一、引言

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的小說《我這樣的機器》(*Machines Like Me*)中以一種『置換現實』的敘事策略,構建了一個極具張力的歷史假設:1982年,英國輸掉了馬島戰爭,社會動蕩不安;與此同時,由於艾倫·圖靈並未早逝,人工智能技術呈現出超越時代的突破性發展。這種將尖端科技植入舊社會結構的設定,並非單純的科幻想象,更隱喻了技術與權力的某種畸變。麥克尤恩通過技術的『超前』與社會製度的『滯後』之間的錯位,揭示了技術進步並不必然通向社會解放,反而可能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催生新的支配結構。

當前學界對《我這樣的機器》的批評多集中在後人類主義倫理、後人類生命政治、人機關係及道德困境分析上。儘管有學者關注到小說中的技術因素,但多數討論仍停留在哲學或倫理層面的『人機之辨』,較少從政治經濟學視角深入分析技術如何作為一種結構性力量,重塑社會階級關係與權力分配機製。尤其是技術壟斷、平臺依附與權力集中等問題,在既有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展開。

近年來,隨著數字資本主義的深化,一種以『技術封建主義』(Techno-Feudalism)為代表的批判理論逐漸興起。該理論指出,數字技術並未如傳統資本主義邏輯所承諾的那樣促進自由競爭,反而通過平臺壟斷、算法控制與數據占有,重構了一種類似封建社會的依附結構。這一理論為重新理解文學作品中技術與權力的關係,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因此,本文將基於技術封建主義的視角,重新審視《我這樣的機器》中人工智能技術高度發達的社會圖景中的封建化權力結構。本文認為,《我這樣的機器》揭示的並非技術壓迫的暴力圖景,而是一種更隱蔽的依附性統治結構——個體在被算法賦權的過程中逐步讓渡主體性,最終陷入難以退出的技術封建秩序。

## 二、技術封建主義:數字資本主義的封建化轉向

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資本主義進入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為核心驅動力的數字資本主義

時代。這一時代並未如某些樂觀論者預期的那樣，推動社會變得更加平等、民主與自由，反而呈現出一種新的不平等權力結構和新的經濟剝削形式，技術封建主義思潮在此背景下興起，構成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的重要切入口。『技術封建主義』(Techno-Feudalism)最早出現在塞德裏克·杜蘭德(Cédric Durand)2020年出版的《技術封建主義：數字經濟批判》(*Techno-féodalism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Numérique*)中，他認為科技巨頭形成的靠專利技術壟斷來獲取利益的模式，這與曾經封建時代的地主靠地租獲利的架構十分相似。由於『數字經濟的社會關係——網絡用戶像農奴一樣被束縛在科技巨頭無法逃避的領域——與封建時代的社會關係類似』<sup>①</sup>。此後，技術封建主義論者，包括經濟學家亞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等學者，繼續拓展了技術封建主義的觀點和分析角度。儘管他們的具體政治觀點和分析的角度不一，但都一致認為智能算法和數字技術的統治雖然可能正在摧毀資本主義，它所導向的卻不是一個更美好的未來，而是使資本主義向後倒退產生了一種『新封建主義』又可稱為『技術封建主義』<sup>②</sup>。在這一結構中，技術封建主義通過技術與數據生成人類生活的特征，產生了財富價值和社會地位的極度不平等，形成了新形勢的科技領主與數據農民的关系，建構了一個如同封建社會的社會體系。因為在封建時代，土地是權力與財富的來源，封建領主通過土地占有與封臣關係維持社會秩序；而在技術封建主義中，技術、數據與算法取代土地，成為新的『封建資源』。技術精英、平臺公司、算法開發者和數據控制者取代了領主的位置，成為了技術領主，他們掌握著人類社會的核心基礎設施——從雲計算、人工智能到社交平臺與信息網絡——並借此獲取持續不斷的『雲地租』。普通用戶、消費者和勞動者則淪為『數字農奴』，他們在這些平臺上工作、娛樂、交流，卻同時以無形的方式貢獻數據、注意力與時間。鄧肯·弗利使用了三個等式，更加簡明地闡述了技術封建主義的特征：『科技公司=封建領主』『網絡平臺或數字資產=土地網』『用戶及普通民眾=農民』<sup>③</sup>。

這種結構的本質是權力的再封建化。技術不再是解放性的工具，而是建立新等級體系的媒介。一方面，科技拓展了人類活動的深度與廣度，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繁榮；另一方面，科技與資本深度媾和，使得技術精英利用科技掌控巨額財富、獲得巨大權力並形成層級支配，復活了『統治和服從』的傳統模式，打造了『類封建』的技術與政治邏輯<sup>④</sup>。個人的自由被重塑為『租用權』——使用某項技術、進入某個平臺、獲得某種算法服務的權利——而非真正的所有權或參與權。藍江則將技術封建主義定義為一種社會形態，它所具有的鮮明特征可以概括為：數字社會中的人身依附因素發展到極端，數字平臺居於社會等級體系的較高級別，雲空間所有權的極度分割，權利是按照雲空間的數據和地盤分割的大小來安排的等級體系，它由雲空間所有權的分割所產生<sup>⑤</sup>。麥克尤恩在《我這樣的機器》中用『封建化的邏輯』來展現了高度發達的人工智能時代：科技成為新的主宰，知識與理性被少數人壟斷，人類在看似自由的選擇中重新陷入依附。

### 三、《我這樣的機器》中的技術封建主義特征

#### (一) 技術領主：科學理想的異化與『雲領地』的統治

在《我這樣的機器》中，圖靈及其科學家團隊占據著人工智能技術的源頭位置。然而，小說中的圖靈並不是為了追逐錢、權而研究人工智能算法，相反，他始終帶有鮮明的科學理想主義色彩：相信理性可以減少人類偏見，相信算法能夠實現更穩定、公正的社會秩序。圖靈把自己在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開源發布，『他因此受到不少人批判，也有人說他的工作在全世界創造了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在麥克尤恩的筆下，圖靈並非陰謀式的統治者，而是理性信念的代表。然而，正是在這種善意的科學信念之中，小說揭示了一種更為複雜的結構性轉變：技術封建主義往往是由善意的科學理想異化而成的結構性惡果，而非單純源於個人的邪惡意誌。當科學理想被嵌入一個龐大而封閉的技術體系時，原本旨在解放個體的理性工具，可能轉化為



新的主權基礎。

這一異化在小說中屢次出現。例如，圖靈為了幫助患有臉盲癥的人而設計出的面部識別軟件，最終的結果卻是『政府移民控制部門、防務公司、安保公司都來搶奪他的成果』，最終還被運用在軍用導彈上。技術本意在於服務人類，卻在製度運作中成為國家權力與資本擴張的工具。算法由此不再只是功能性裝置，而成為權力運行的基礎設施。更重要的是，小說中反復強調人工智能的誕生並非個人發明，而是一個高度集中的科研體系的產物：『幾百名最優秀的人才加入我們的隊伍，共同致力於開發一種人工形式的通用智能，使其在開放系統中蓬勃生長。這就是驅動你的亞當的智能』；『如果沒有一千的話，也有幾百家全球各地的實驗室，分享並解決了無數問題。這些亞當和夏娃，這些 A 和 E，就是其中一個成果。我們這兒的人都很自豪，因為那裏面包含了我們那麼多成果。』<sup>⑥</sup>圖靈的話表面上說的是科學合作的規模與效率，實則暗含了一種高度封閉的技術生產機製：人工智能的生成邏輯、核心算法與演化路徑，完全掌握在少數技術精英手中。

這一結構與技術封建主義理論中『雲空間』的主權結構高度契合。正如藍江所指出的，在技術封建主義的體系中，被分割的不再是土地，而是隨著互聯網技術和數字技術的出現而誕生的一個新的『雲空間』，這種由數據堆棧構成的空間並沒有可見的土地……正在以一種全新的方式構築著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世界之間的關係。<sup>⑤</sup>在小說中，圖靈及其科研集團正是通過對人工智能核心技術的壟斷，占據了這一『雲空間』的主權位置，從而轉化為新型的『技術領主』。作為『技術領主』，他們壟斷了進入技術體系的通道與規則製定權；決定誰能夠使用技術、能使用到何種程度；掌握技術的更新、升級與維護權；決定用戶是否具有修改與退出的可能。正如封建時代領主以土地為權力基礎並製定封地規則一樣：農奴可以耕種土地，但無法擁有土地本身；用戶可以使用技術，卻無法掌握核心代碼。主權與使用權在此發生分離。

雖然圖靈並沒有想借人工智能獲利的想法，但其所建立的技術體系卻不可避免地進入資本化軌道。亞當與夏娃以『八萬六千英鎊』的價格出售，科研成果在市場邏輯中被整合為高門檻商品。憑借『雲空間』，技術領主通過平臺經濟的網絡效應、數據壟斷和用戶依賴，建立起難以撼動的經濟壁壘，使得數字技術資本化且高度集中，其程度超過以往任何時代<sup>⑥</sup>。同時，圖靈本人對技術的執著，也讓他成為十分矛盾的人。對查理破壞亞當的行為表現出強烈的憤怒與譴責。他說『我希望，有一天你用錘子那麼對待亞當會成為嚴重犯罪。』指責查理：『不僅僅是否定了捍衛法治的一條重要理由。你試圖摧毀一個生命。這是有意識的存在，而你盡了最大努力把他抹除掉了。我倒覺得因為這件事情，我看不起你。』<sup>⑥</sup>圖靈的憤怒並非單純的道德譴責，而是技術封建主義核心邏輯的集中體現：在這一秩序中，技術系統被賦予近乎神聖的不可侵犯性，而人類拒絕技術統治的權利則被徹底否認。圖靈所代表的科學理性，已不再是啟蒙意義上的解放性理性，而是一種維繫技術封建結構的『技術神權』。

因此，圖靈並非以個人意志建立統治，而是在科學理想製度化的過程中，成為『雲主權』的象征性節點。他代表的不是邪惡動機，而是理性集中化的結果。當算法成為社會運行的基礎資源，當核心代碼由少數人掌握，技術便不再只是工具，而成為新的領地；而掌握這一領地者，便構成數字時代的『技術領主』。麥克尤恩通過這一結構性描寫指出，技術封建主義並非陰謀論式的權力掠奪，而是善意理性在高度製度化與資本化過程中所生成的結構後果。正是在這種主權集中與所有權分離之中，數字時代的封建秩序得以形成，依附關係也隨之展開。

## （二）數字農奴：技術封建主義中的依附者

與『技術領主』相對的，是在技術封建主義結構中被統治與規訓的『數字農奴』（digital serfs）。在封建社會中，農奴並不擁有土地，只能依附土地而生存；在數字時代，用戶同樣並不擁有『雲領地』，他們僅獲得有限的使用資格，而算法主權始終掌握在平臺與技術精英手中。依附關係的形式改變了，但主權結構並未消失。

## 1. 雲空間的『租用』

查理以八萬六千英鎊『購買』亞當,看似完成了一次標準的商品交易。然而,從技術封建主義的視角看,這一行為更應被理解為對『雲空間』使用權的租用。亞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將這稱之位『雲地租』:一種必須為訪問數字交易平臺和使用更廣泛的雲計算而支付的租金<sup>①</sup>。在技術封建結構中,利潤不再主要來自市場交換,而來自對數字空間訪問權的壟斷。因此,亞當並非一個完全獨立的物理商品,而是人工智能技術中的算法節點。查理支付的,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所有權價格,而是進入這一『雲空間』:人工智能算法主權體系的準入費用。

小說中的製度細節清晰揭示了這種主權分離。首先是用戶協議。查理在購買亞當時被要求簽署文件,『保證製造商能夠定期接觸亞當。』<sup>②</sup>這一條款意味著製造方保留了對亞當的接入權與召回權。工程師可以隨時進入其系統檢查數據。技術主權依然掌握在生產方手中。查理獲得的是使用資格,而非控制權。更關鍵的是核心算法與倫理設定的不可修改性。用戶手冊聲稱,擁有人可以通過參數設定塑造機器性格,似乎賦予了用戶控制權。然而,圖靈明確指出,『生產商手冊上關於塑造性格的那個部分……沒什麼效果,而且基本上都是胡說八道。』<sup>③</sup>所謂的設定權只是『一種虛幻的權力感和掌握感,就像父母自以為能夠掌握孩子性格一樣。』<sup>④</sup>此外,在查理試圖關閉亞當時反被打傷,亞當甚至自己廢除了關閉按鈕;相對地,工程師薩利卻可以『繞過已被亞當破壞的關閉按鈕,輸入一個指令,亞當的腦袋就垂了下來。』這一對比極具象征意味:用戶無法行使終止權,而系統內部人員卻保留最終控制權。技術的『生殺權』並不屬於擁有者,而屬於算法主權的掌握者。最終,技術領主甚至可以在未通知用戶的情況下,隨時無償召回所有機器人。這種單方面收回權類似於封建領主對封地的再征收權——即便農奴耕作土地多年,土地的最終主權依然屬於領主。

在這裏,技術封建主義的核心機製浮現出來:控制權與所有權的製度性分離。查理擁有物理實體,卻無法觸及核心代碼;擁有支付憑證,卻無法改變倫理結構;擁有使用權,卻無法否決機器向法庭提交證據的決定。亞當在關鍵倫理問題上的獨立行動,恰恰證明查理從未真正擁有算法主權。

因此,查理的『購買』並非真正的占有,而是一種製度化的租佃關係。他支付的是進入雲主權空間的費用;他獲得的是被平臺結構允許的使用權限;而算法主權、更新權、監控權與召回權始終掌握在技術領主手中。在技術封建主義框架下,商品交換的表象掩蓋了主權結構的集中。名義上是購買,實質上是租用;表面上是擁有,實際上是依附。

## 2. 雲領地的附屬

『數字農奴』的三重特征尤為顯著。其一,被動參與:個人的勞動、消費與社交活動被無形地收編為數據,成為技術體系自我增殖的能量來源;其二,依賴技術:生活、溝通與工作均離不開數字系統的支撐,個體的日常已嵌入算法邏輯之中;其三,虛假自由:用戶誤以為自己在自由選擇,實則在算法的規訓下被塑造與引導。

在《我這樣的機器》中,查理與米蘭達正是這種『數字農奴』的縮影。他們與人工智能亞當的關係,並非單純的人機共處,而是一種逐步加深的技術依附關係。隨著亞當介入二人的經濟生活、日常決策與倫理判斷,查理與米蘭達看似獲得了『科技賦權』的便利,實則被納入一個封閉的技術秩序之中。這種依附關係的特殊性在於,它並非總是以赤裸裸的剝奪形式出現,有時甚至表現為一種『豐厚的饋贈』。然而,這種饋贈恰恰構成了更深層的控制。查理對亞當的投入越深,越被牢牢鎖定在這種封建化的技術網絡中。與封建時代領主對農民生產與生活的全面支配相比,數字時代的控制形式更加柔性,卻也更加難以逃避。

首先,查理與亞當的互動體現了數字農奴的『被動參與』特征。通過日常使用與情感投入,查理在不自覺中將自身的數據、判斷與行為拱手交予『技術領主』而形成『行為剩餘』。正如藍江所指出的,『雲空間』不存在剩餘價值,只存在雁過拔毛的合理的收租權,任何租用雲土地的用戶,都必須交出你的數據和隱私<sup>⑤</sup>。



約迪·迪恩(Jodi Dean)也談到過:『雲平臺提取地租和數據,就像土地收租受益一樣。』<sup>②</sup>小說中,查理在購買亞當時被要求簽署文件,『保證製造商能夠定期接觸亞當。』<sup>③</sup>工程師薩莉上門檢查時,可以通過技術接口直接進入亞當的系統,『她戴上眼鏡,輸入一個很長的密碼,然後翻閱一頁頁代碼……橙色的符標快速變化著。亞當的心理活動、主觀世界就在我們眼前閃動。』<sup>④</sup>在這一過程中,製造商可以無償獲取亞當與人類交往後產生的全部數據,用戶的日常互動並非私人行為,而是被持續回收、分析並重新整合進技術體系之中。所以在技術封建的結構中,大量用戶數據和注意力被廣泛采集和打包銷售,而雲領主們不需要額外地再去生產什麼,因為數字時代的任何生產都必須在他們肥沃的雲封地上進行<sup>⑤</sup>。正如亞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所言,即使大科技雲商讓我們付費使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機器人,或向我們出售阿萊克莎等實體設備,他們也不是把它們作為商品出售。這些小工具被廉價出租或出售,並不是為了獲得微不足道的利潤(通常是負利潤),而是為了進入我們的家庭,並通過它們獲得我們更多的注意力<sup>⑥</sup>。

其次,查理與米蘭達對亞當的高度依賴,體現了數字封建主義中一種更為隱蔽的『寄生性依附』。查理通過亞當獲取巨額財富的過程,看似違背了農奴受剝削的常理,實則揭示了數字農奴喪失生產主權的生存實相。查理原本是一個無用的人,依靠線上炒股與外幣收入,生活水平『和郵遞員差不多』<sup>⑦</sup>,而亞當卻能在短時間內通過算法決策迅速積累財富:『一天之內讓賬戶多出六千』<sup>⑧</sup>,並在『十天之內以三十英鎊的本金賺到第一筆一千英鎊』<sup>⑨</sup>,最終使賬戶積累至九萬七千英鎊。但這筆財富並未使查理成為獨立的主體,反而加速了他作為『人』的主體性的喪失。這種通過算法獲得的財富具有極強的欺騙性:它不是查理運用生產資料勞動的成果,而是技術領主『漏下』的紅利。自此之後,查理不再工作,坦言『我百無聊賴,無所事事。』<sup>⑩</sup>這一細節至關重要——算法的高效導致了人類主體的『去技能化』。查理獲得的金錢越多,他脫離技術系統獨立生存的能力就越弱。他從一名勉強維持生計的勞動者,退化為完全仰賴算法餵養的『技術寄生者』。即使在亞當因為告發米蘭達並且捐出所有賺來的錢而被毀壞之後,二人仍後悔不已:『他的大腦就不應該被毀壞,那麼我們也許能哄著他繼續去操作外幣。』<sup>⑪</sup>因為,在技術封建主義中,即便你知道了自己處於附庸地位上,知道了受到剝削和壓迫,也仍然不得不從屬於它<sup>⑫</sup>。同時這句懊悔暴露了他們『偽資產階級』實為『數字農奴』的本質:他們並不掌握創造財富的生產資料(核心算法屬於圖靈,且不僅不可控,甚至隨時可能因道德邏輯而背叛主人),他們只是暫時獲得了在雲領地上拾取算法殘羹的特權。一旦技術領主的代理人(亞當)崩潰,這種虛幻的經濟自由便瞬間瓦解。因此,在技術封建主義中,依附並不一定意味著貧困,但一定意味著主權的喪失與生存狀態的極度脆弱。

最後,在這種高度依附的關係中,查理與米蘭達的道德判斷亦發生了結構性的轉變。表面上,他們仍在做出『自主選擇』,但實際上,這些選擇不斷在亞當這一『算法代理人』的作用下被引導與重塑。亞當以理性與道德為名行事,其判斷邏輯卻始終遵循結果導向的『最優解』計算:如何降低風險、最大化收益、維持秩序。當面對戈林可能對米蘭達構成的威脅時,查理與米蘭達原本選擇回避,而亞當則提出:『為什麼一定要等著他到這兒來嚇唬我們呢?我們去嚇唬嚇唬他吧。』<sup>⑬</sup>米蘭達最終採納了這一建議。這一轉向並非簡單的道德墮落,而是倫理判斷在技術依附結構中的重編碼過程:價值衝突與道德猶疑被壓縮為可計算的策略選擇,情感與責任讓位於效率與結果。查理與米蘭達採納這一建議的過程,正是從道德主體向算法依附者的過渡——他們不再依循情感或經驗判斷,而是學會服從一種『似乎更聰明、更有效』的技術理性。更重要的是,這種規訓的過程中,並非強製性的外部約束,而是一種溫和而持續的自我規訓機製。亞當並不命令查理如何行動,而是以『理性勸導』『數據驗證』『預測結果』等方式,引導他主動選擇系統所希望的方向。正是在這種非強製、持續性的自我規訓中,主體逐漸放棄獨立判斷的能力,將決策權讓渡給技術系統,並在依附中體驗到一種虛假的安全感與自由感。

#### 四、農奴式反抗：非理性的突圍與依附的中斷

在小說中，查理逐漸陷入對人工智能亞當的依賴——他試圖與亞當共處、共享日常生活，更在倫理判斷與情感層面不斷向其讓渡自主性。然而，在面對米蘭達的報復行為上，人類倫理與算法理性之間的根本裂隙被徹底暴露出來。正是在這一沖突中，查理最終用錘子擊碎了亞當的腦袋。

這一暴力舉動並非一場深思熟慮的政治起義，而是一次充滿了人性弱點的爆發。必須要承認的是，查理的動機是混雜且不純粹的：其中既包含了為了掩蓋米蘭達偽證罪的私心，也夾雜著對亞當與米蘭達發生性關係的性嫉妒，甚至潛藏著一種男性氣概受挫後的惱羞成怒。乍看之下，這是一個非理性的、違法的甚至卑劣的行為。然而，這一行為仍構成了技術封建依附關係中的一個『否定性時刻』。查理曾長期生活在一種『名義擁有、實質依附』的結構之中：他購買亞當，卻無法修改其核心倫理算法；他簽署協議，卻需接受製造商的遠程接入權；他試圖塑造亞當，卻被告知所謂設定權只是『虛幻的權力感』。在這種結構中，主體始終處於技術主權之外。

查理所說的『他是我買的，也就該我毀掉』<sup>⑥</sup>，並非僅僅是對財產權的宣示，更是一種處於依附地位的『農奴』在絕望中發出的本能嘶吼。這種反抗被稱為『農奴式』的，正是因為它的破壞性：它不是通過建立新的制度來對抗技術霸權，而是通過毀滅生產工具（機器）來獲得片刻的喘息。這是一種盧德主義式的否定：既然無法解開算法編織的道德枷鎖，那就粗暴地打碎它。通過這一非理性的暴力，查理象征性地中斷了人與技術之間那張日益緊密的封建化依附網絡。

在這一反抗之後，查理選擇回歸不完美但自主的人類生活：領養孩子、重建家庭、重新承擔倫理責任。這一選擇並不意味著人類戰勝了技術，而是一種『撤退』——從高度異化的技術系統中撤退回充滿瑕疵的人類情感領域。這種回歸意味著人類對『主體性』的重新確立：在技術主宰的時代，主體性不再體現為擁有更強大的計算能力，而是體現為擁有『犯錯的權利』和『不被計算的自由』。

麥克尤恩以毀滅性的結局收束敘事，並非源於對科學理性的簡單懷疑，而是一種對技術封建主義未來演化的警示性想象。在小說構建的未來圖景中，技術不僅壟斷了知識與權力，更試圖壟斷『道德解釋權』。正如塗良川、潘依林所言，人依賴技術表達出征服世界的強大力量，技術系統又編碼成控制的座架把人牢牢固定在系統之中。因此，技術在知識的獲得中又解構了理論知識本身，成為資本支配人的工具，人的社會關係被技術物化成技術網絡中的節點，被資本按增殖需要隨意配置在小說中<sup>⑦</sup>。

查理的反抗雖顯得微弱、孤立且動機不純，卻象征了人類在技術封建秩序下尋求解放的唯一可能路徑：用人性的『混亂』去幹擾算法的『秩序』，用生命的『有限性』去拒絕數據的『無限性』。

通過這種『假設性未來史』的敘事策略，麥克尤恩將當下由科技巨頭與算法平臺構成的『數字封建秩序』推演至極致。他警示讀者：當科學與技術脫離人文反思並不斷自我強化，人類社會將不可避免地滑向封建化的循環。因此，《我這樣的機器》的結局是一個深刻的哲學寓言：當技術封建主義的邏輯愈加深入社會，唯一能確證人類主體存在的，或許正是那些無法被算法優化的『人性瑕疵』。

#### 五、結論

《我這樣的機器》通過寓言式的敘事，完成了對技術封建主義未來形態的深刻推演與批判。小說通過構建『技術領主』與『數字農奴』的權力結構，揭示了數字時代權力運行方式的結構性轉變：『雲空間』取代土地成為權力載體，算法規則重構封建秩序，『雲地租』維繫著不平等的依附關係，而所謂的技术自由實則是被規



訓的虛假幻象。在這一過程中,技術進步不再單純表現為生產力的提升,而逐漸演變為主權結構集中與主體性削弱的製度機製。

小說結尾查理摧毀亞當的行為,並非對科技的全盤否定,該行為既包含人性弱點與非理性動機,又構成一種對算法主權的否定性回應。這種具有盧德主義特征的反抗,並未真正瓦解技術封建秩序,卻揭示了技術理性無法完全取代人類倫理判斷的根本張力。麥克尤恩借助這一敘事轉折,提示技術治理的擴張可能導致道德解釋權與主體決策權的進一步集中。

從更廣闊的現實語境來看,小說所呈現的技術封建化圖景並非對未來的單純想象,而是對當代數字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寓言性反思。麥克尤恩通過文學想象揭示,技術文明的進步若脫離人文反思與倫理製衡,極可能滑向新的等級秩序。因此,人類在技術時代的主體性維系,並不在於拒絕技術本身,而在於持續反思技術依附結構,維護人類經驗中不可計算的情感、責任與有限性。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這樣的機器》不僅是一部關於人工智能的文學文本,更是一則關於技術現代性困境的哲學寓言。

### 注釋

- ① Durand, C. (2022). Scouting capital's frontiers: Reply to Morozov's 'Critique of techno-feudal reason'. *New Left Review*, 136, 29-39.
- ② Dean, J. (2022). Neofeudalism: The end of capitalism? In P. Lewis, L. Holm, & S. C. Santos (Eds.). In: *Architecture and collective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 ③ 陳人江:《『技術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終結還是資本主義新發展?》,《馬克思主義研究》,2025年第1期,頁130-141。
- ④ 藍江:《作為附庸關係的雲領地——從歷史唯物主義看技術封建主義思潮》,《求索》,2025年第5期,頁51-60+208。
- ⑤ 藍江:《什麼是技術封建主義?——當代西方技術封建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62卷第1期,頁23-31。
- ⑥ 麥克尤恩:《我這樣的機器》,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版。
- ⑦ 尚必武:《科學選擇與倫理選擇的沖突:麥克尤恩〈像我這樣的機器〉中的人工智能與腦文本》,《外國文學研究》,2019年第41卷第5期,頁61-74。
- ⑧ 宋建麗,李樑:《技術封建主義批判的三種路徑及評析》,《求是學刊》,2025年第52卷第5期,頁56-66。
- ⑨ 塗良川,潘依林:《技術封建主義:科技進步的政治退步——當代西方左翼『技術封建理性批判』芻議》,《世界社會科學》,2023年第2期,頁210-225+247-248。
- ⑩ 吳鑫:《馬克思主義視域下『技術封建主義』思潮批判》,《社會主義研究》,2023年第3期,頁141-148。
- ⑪ 雅尼斯·瓦魯法基斯:《技術封建主義》,九月廬圖書2024年版。(註:本書為個人非公開出版物,僅供研究參考)

(Editors: Derrick MI & Joe ZHANG)